

駝峰航線上的飛行員

· 徐天佑 ·

民國二十六年初美國陸軍航空隊

退役上尉飛官陳納德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，獲聘為中華民國空軍顧問，陳納德因其人脈和技術獲得老總統蔣中正及宋美齡的信任，並以空軍上校的階級禮聘，陳納德復在美國招募約一百名飛行員，其中約四十名來自陸軍航空隊、六十名來自海軍及海軍陸戰隊，大多數為後備役軍官，也有少數為美國政府授意由航空隊退役前往美國志願航空隊AVG (American Volunteer Group) 服役的飛行員。這些飛官接受過戰鬥機訓練者不到三分之一，大部分由轟炸機飛行員轉任而來，另外也招募了約兩百名地勤人員，名義上都是中華民國「中央飛機製造廠」的僱員。

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，美國志願航空隊成立，總部設在昆明，即著名的「飛虎隊」，並任命陳納德為美國志願航空隊司令。飛虎隊的各項物資油料彈藥所需也因而大量增加，民國三十一年三月，日軍佔領緬甸仰光，封鎖滇緬公路，為突破日本封鎖線，於是中美聯合啓動規劃駝峰航線，以

為因應。

駝峰航線的開啓，將所需的戰略物資以飛機運往我國，另外前往中國大陸的轟炸機與戰鬥機，均經由此條航線進入我國大陸，且提供飛虎隊即我軍方使用。

駝峰航線分為兩條路線，北線由印度的汀江經葡萄、雲龍、雲南驛到達昆明，長約八百二十公里，南線由印度的汀江經密支拿、保山、楚雄到達昆明，長約八百八十五公里，經過的地區都是高山峻嶺，而這條由印度阿薩姆省飛往雲南的航線，必須穿越喜馬拉雅山，高度海拔六千公尺以上。喜馬拉雅山是由歐亞大陸板塊與印澳板塊擠壓的造山運動所形成，山脊層層疊疊，這些山峰有如駱駝般的峰背，故而航線名為駝峰航線，英文名為「The Hump」。當時山區無氣象臺，美國空軍駐昆明地區只有一名氣象參謀，航線山區氣象無從得知。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日沃爾德中校親率機隊勇闖試飛成功，基地指揮官哈定為了鼓舞士氣，就在基地門口豎立了一塊「駝峰上無天氣」的英文大牌。

事實上駝峰天氣變化無常，主因高空噴射氣流被喜馬拉雅山分割為南北兩支，南支正好經過駝峰航線，形成天氣現象所謂的南支槽，亦被稱為駝峰槽，並將孟加拉灣的水氣帶入青康藏及雲貴高原，因此貴州有一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兩銀。」的地方諺語，足見當地的地形、天氣與民風。

沃爾德中校是運氣好，在四月天氣較穩定的日子試飛，而安全完成任務，也帶動當時駝峰航線中美運補的進行。我方當時由中央航空公司執行任務，美方則由陸軍航空隊進行，執行的軍機機型有C-46、C-47、C-54型運輸機。

當時的飛機因無壓力艙設備，因此飛行高度限制在七千米以下，運補飛機只能在群山間隨著起伏的山脈飛行，峰巒高低不等，氣流不穩定，因此飛機飛行時而高高低低，日常天氣也常出現濃厚的積雲、暴雨、冰雹、飛機積冰，即使晴朗無雲的天氣，也會產生晴空亂流，再加上新進駕駛未曾經歷高山天氣飛行的經驗，而且任務繁重，飛行時間長，所以失事率甚高，當時被視為死亡航線，但兩國飛行員視死如歸，不顧犧牲，銜命完成使命。

駝峰航線是一條非常繁忙的航線，飛行員日夜不停的飛行，緬甸密支拿淪陷日軍後，兩線時而受日機干擾，更增加運補困擾，後一度改為夜間飛行，考驗駕駛員的臨場反應。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總共飛越駝峰航線的飛機計八萬多架次，繁忙時一天起飛六百五十架次。飛機從印度北部十三個機場起飛，飛往中國大陸六個機場降落。運送物資約六十五萬噸，其中我方飛行員共載運七萬五千噸。

根據美空軍一名轟炸機隊員飛越駝峰的日記記述：「在飛行途中，可以看到山腰與樹叢間，遍布飛機殘骸的反光，有美國、英國及日本的飛機，美軍空運司令部稱之為鋁谷（Aluminum Trail）。」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越駝峰航線執行任務，共約六百架飛機墜毀，主要為C-47、C-54兩型機，損失飛行員超越一千五百人，犧牲頗為慘重，也因為有這些冒險奮進，無視性命生死的飛行員，終致戰爭補給無虞，贏得持久戰的勝利。

美國志願航空隊是我雙方合作的結果，也贏得戰爭最後的勝利，而駝峰航線所扮演的運補角色，亦功不可沒，這些都是八十年前的往事，值得後人懷念與共享。

悼 余英時大師

· 采芸 ·

以「我在的地方，就是中國。」而聞名於世的當代史學大師余英時，今（民國一一〇）年八月一日逝於美國，享年九十一歲。余英時拜於國學大師錢穆門下，以現代學術研究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，曾獲得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奇獎，也被美國國會盛讚為「在中國和美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」，他被認為是「中文歷史界第二次現代化重要的發軔人物」，也因此他所作的《歷史與思想》被推舉到與錢穆的《國史大綱》同一個高度，成為學中國史之人必須通讀的經典之作。

余英時學貫中西，涵蓋古今，曾先後在哈佛大學、耶魯大學、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教授，作育英才無數，我國史學大家黃進興（中研院副院長、院士）、王汎森（院士）以及臺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都是他的學生。

余英時的辭世，不僅學界、文化界同聲哀悼，就連政界、媒體界等社會各界也都紛紛以不同方式致哀。我認為余英時的影響力之所以能那麼廣、那麼大，除了他在學術方面卓越豐

碩的研究成果外，更是因為他的風範、他的行動，他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文化的底蘊涵養，也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文化人挺立的脊樑傲骨。

余英時認為中國人的普世思想就是把人當人，肯定每個人的獨立性與價值感，而這正是民主自由價值的精髓所在。因此余英時說他沒有崇拜的偶像，有的只是佩服的對象，因為這些令他佩服的人，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，為他帶來了新的東西、新的價值，提供了他寶貴的智慧。

面對這個網路普及、價值多元的時代，余英時不改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，強調成為一個專業的歷史學者之前，他更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，因此一定要講「良知」，要「以天下為己任」。他闡述道，在中國，每個人都可以是聖人，什麼是聖人？無關於社會地位、更與做大官做大事毫無關係，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懷抱著對社會有貢獻、對別人有益處的理想，就是聖人。

我想余英時大師留給我們軍人最珍貴的啟示，就是讓我們深以保家衛國的使命為念為榮。願身著軍服的每一個我們，都能在工作崗位上，勤懇戮力，為我們這一代人、甚至是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奮進不懈。